

“摄影巾帼”侯波记忆中的红镜头¹⁾◆ 吴志菲

侯波,著名新闻摄影家,1924年出生于山西夏县,先后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游击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青训班、延安保安处、延安大学工作学习,后历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新华社摄影部高级记者及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当选过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还受聘担任过中国图片银行名誉行长。

一个下午,记者如约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按响一个普通单元的门铃,“噢,你们来了,快进来吧!”一位面容清秀、身材瘦削的老太太笑着招呼我们进屋,虽然岁月的雕刀在她脸上刻下衰老的印迹,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共和国第一代女摄影家、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原主席侯波。

从香山到天安门

一进屋,我们立即被客厅正面墙上挂着的一张大照片吸引住了——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于是,我们的采访就从这张合影谈起了。

说到这张照片,侯波陷入了深情的回忆之中。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5月。那时,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其丈夫、摄影家徐肖冰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是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厂管。但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那次会见结束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这时,毛泽东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后,便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

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陈赓在你家乡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呢!”毛泽东的一番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毛泽东,心里自然有点紧张,不敢与毛泽东坐得太近,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她一下轻松多了。

聊了一会儿后,想到不能过多占用毛泽东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告辞,可侯波心里总感到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与侯波他们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举着照相机,为侯波夫妇俩跟毛泽东拍摄合影。侯波、徐肖冰忙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毛泽东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清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采访时,侯波深情地注视着这张大照片,感慨万千:“这张照片我们珍藏好几十个年头了,每当抬头看见它,我就会想起那次照相的每一个细节。那时我们多年轻!毛主席多年轻!共和国多年轻啊!”

在用相机记录领袖的日子里,侯波基本上都泡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出发。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麻烦,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我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照。”侯波兴奋地说道。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天。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令人们激动的一瞬间,给后世留下永恒的经典画面。当时她端着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穿梭在城楼上。为了抓拍最佳镜头,她冒着危险卧在天安门城楼的琉璃瓦面上。周恩来看到了,忙用手拽住她的衣角,她拍完后,发现周恩来还在拽着她的衣角。“那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为了能拍到他们的

正面,我只好将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一点掉下去,幸亏别人及时扶了我一下。”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形象十分传神。

从“阎千金”到“侯波”

侯波其实本姓阎,她这个长孙女出生时,爷爷非常高兴,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来到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当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再后来她到了延安,为了保密工作的需要,保安处处长周兴为她取名“侯波”。“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

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近15公里为学校念书。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厄运始于侯波父亲的身亡。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惹恼了资本家,在回家的路上被资本家派人暗害了。“得到这个凶讯,家人非常气愤,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穷人怎么斗得过资本家,全家只得在一片哭声中咽下了这口恶气”。后来,在运城教书的姑姑又因病去世。侯波的爷爷受到这两次致命的打击,悲伤不已,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家境一下子陷入穷苦的泥沼,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母亲临终时对只有13岁的侯波说,要照顾好3个弟弟。“那时,日本鬼子已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

一天早晨,一个小学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说是有些事情要商量。去了之后,比自己大几岁的另一个女同学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中条山上的游击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活动,咱

16.他想见见那个日本人

半坡老人在宽大的书房里与袁朴生对坐。这是他待客的最高规格了。陶半坡六十七八岁,鹤发童颜,双目如炬。其父陶佛智与李鸿章是道光24年的同科举人。他本人,光绪2年的进士,做过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来在江西、湖北为官,政声颇佳却得罪了官场小人,最终不肯同流合污,愤而弃官还乡。他的书法在江南堪称一绝,有“半坡体”之美称。方家称其书风金钩玉骨、气势开张而举重若轻,如在虚静中炼气化作神。

袁朴生拜首问安后便直奔主题,一口气把古子樱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他的心怦怦直跳,总觉得词不达意。其间半坡老人两次站起来走到书柜前翻查什么数据,让袁朴生的叙述更有些生涩而拘谨,他当然避开了莫水馨,但实际上这是他唯一的牵挂。

半坡老人听完后沉吟半晌,抬起头只说了一个字:好。袁朴生发现,半坡老人以往那双云山雾罩的眼睛突然变得雪亮。然后半坡老人说,他想见见那个日本人。

于是,三天之后,半坡老人破例设家宴为袁朴生饯行,按照老人吩咐,古子樱也忝列末席作陪。陶半坡那天兴致极高,吩咐下人开了一坛30年的花雕老酒。袁朴生这次放开了,喝起酒来干净利落,三杯落肚居然脸色不变,颇得陶半坡赞赏;古子樱始终像个哑巴,怎么也放不下一份底气不足的拘谨,他只是觉得,清国的酒气场太老,盖子打开,单是那酒的浓烈香气,就可以把他放倒。而酒过三巡之后,陶半坡那滔滔不绝有如江河日下的宏论,更让他呆在那里如同木鸡。

陶半坡问古子樱,知道日本的茶道是什么时候从我国传过去的吗?古子樱恭恭敬敬地回答,最早可以追溯到贵国的唐宋时期,有400多位日本的高僧在贵国留学挂锡,他们归国时,就把茶籽和茶宴的抹茶法,还有茶礼、茶器带回到日本,促成了日本茶道的产生。陶半坡微微颌首,又问:有一本《吃茶养生记》,你读过吗?知道是哪个日本人写的吗?古子樱站起来鞠躬,脸有些涨红道:回大人,不好意思,学生才疏学浅,没有读过这本书。

陶半坡瞥了他一眼,慢吞吞地说:宋代的

们应该去找他们,为抗日出力。回到家中后,侯波跟奶奶商量。奶奶二话没说,从柜子里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4块银元。“我今天还记得,当时奶奶对我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我怀揣4块银元,穿着奶奶做的布鞋上路了。”侯波回忆道。

中条山是当时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山上的游击队是同盟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决死队。上了中条山后,侯波她们被决死队分配到各村发动群众给抗日前线的战士做鞋袜和鞋垫。在这里,侯波学会了许多当时十分流行的救亡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快,不长的时间就收集起几千双鞋子,通过抗敌决死队送到前线去。不久我又得到通知,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虽说这一去离家更远了,可是不去是不行的,只有投奔革命队伍才有生路。”

在经历一路艰难的跋涉后,侯波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她在班里表现积极、好学、上进。有一天,青训班的人事科长找侯波谈心,问了侯波家里的情况及个人的理想之后,突然发问——你想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只有14岁,也不太明白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入了党以后会怎么样,但从身边的那些大人们的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里面的人都是好人。于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就说:想!”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了右手……

“七大之后,才规定入党必须年满18岁。可我们那时候,还有十二三岁就入党的呢。”也正是因为入党时年龄太小,又无法找到入党介绍人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侯波曾长时间被认定为假党员。“事也有凑巧,多年以后,我的大儿子已经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回到北京。他告诉我说他一个同学的父母认识我,后来见面一看,却正是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王宁娜和刘志明,只是他俩后来也改了名字而失去联系。这真是历史开的玩笑!”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11.这个人的心思可真猜不透

陈家的茶房设在戏园的二楼,面积也不大,里面搁一条长木板,上面放茶杯,茶杯一只只的叠得很高;旁边放着几只煤球炉,比一般家用的煤球炉要大,烧着开水;如果自己烧的不够用,那就到旁边老虎灶去泡开水。当然,观众不会一直把茶杯捧在手里,那岂不受罪。为了适应观众所需,戏园的靠背椅的背后都安装有插口,茶房里备有装置,即是一根铁丝一端拗成挂钩,另一端拗成圆圈。观众叫了茶,钩子往插口上一插,茶杯底小肚大,往圆圈里一放,恰巧卡住,简便嘛,又实用,观众就稳稳当当地一边看戏一边喝茶了。

一般来说,每到下午三四点钟,戏演到一半左右,热毛巾出来了,如果你需要,只要示意一下,热毛巾就会飞过来,还可以飞出各种花样,变成戏园的一道风景。观众擦洗好,享受完了,把钱裹在毛巾里,或扔回去,或等人收回去。陈家人的人手不够,雇了两个亲戚做帮手,这些人的收入有限,只能维持一家人的粗茶淡饭。虽说刘、陈两家,近在咫尺,可刘家烧肉、陈家闻香,刘家猜拳、陈家闻声。不过,筱文艳未来的公婆人穷骨头硬,一年三百六十日,三餐不上刘家的桌子。纵然逢年过节,刘家相邀,陈家也总是先送礼、后上门。

陈家生有三子,长子余清,次子玉虎,老三志忠。刘大麻子将筱文艳许配给老二,老二比筱文艳年长一岁。应当说刘家对二侄子玉虎是“另眼相看”,吃住都在刘家。按理说,侄儿作子,自古有之。然而,刘家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却另外领养了一个儿子,偏偏这养子身子骨娇嫩,体弱多病,上学读书又怕被人欺侮。因此,刘大麻子想出了个主意,名为出钱供侄儿读书,实际上是要侄儿照料她养子,保护她养子,当他的书童和伴读。等她的养子上学读书都能自理时,侄儿自然就停了学。玉虎十五岁开始,便替刘家管理出租的三轮车,刘家也就多了个不拿工钱的小伙计。这个小伙计也真忠心耿耿,手脚勤快,除了放车收租



外,还学会了修车。除此之外,他还要到剧场后台做检场,即搬置道具。

陈玉虎和筱文艳不论论桌吃饭,或是在后台见面,都是形同陌路,从来不讲一句话。有几次,筱文艳趁没有人,想和他诉说一下心里话,探探他将来的打算,然而陈玉虎总是扭头便走,容不得她讲一句话的机会。平时,在后台演出时,演员们也拿他俩开玩笑,对陈玉虎说:“二骡子(他生得胖,走路缓缓的,所以给了他一个‘二骡子’的外号),文艳来了。”他一听,脸一红,扭头就避开;或者筱文艳在卸妆,他们对她说:“文艳,二骡子来了。”她也扭身便走。就这样,两人从定亲到结婚,像冤家对头般整整过了四年。她把冲破牢笼的希望寄托在未来女婿的身上,但是得不到一星半点的保证,这个人的心思可真猜不透!

1938年的农历二月初八,筱文艳十六岁,刘大麻子匆匆地安排她和陈玉虎完婚。所以匆匆完婚是有原因的。这是个寒冷的春天,日本兵的铁蹄沉重地踩在人们的心上,人们呻吟着、挣扎着、反抗着。自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一大批淮剧艺人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苏北根据地,民乐大戏园也就成了京剧场子。三月一期,半月一班,京剧演员们走马灯似的换了又换。筱文艳是固定的演员,每个班期都有她,自然唱的也都是京剧。如果这期班底里有头牌旦角,筱文艳就唱二路角色,如果班底里没有头牌旦角,那么筱文艳就挂牌唱头路。筱文艳后在京剧《贵妃醉酒》里饰演杨贵妃,《二堂放子》里饰演王桂英,《乌龙院》里饰演阎惜娇,《红鬃烈马》里饰演王宝钏,《贺后骂殿》里饰演贺后,《白蛇传》里先后饰演过白娘子和小青,《阴阳河》里饰演李桂莲,《汴梁图》里饰演西宫等。筱文艳戏越唱越好,戏路也越唱越宽,有了一定的观众基础。这对刘家来说,又喜又忧,喜的是这六十元钱买来的“养女”,已经成了摇钱树;担忧的则是,从小待她刻薄,这个“养女”同他们没有多少感情,一旦成了名角儿,随时有振翅高飞、离开他们的可能,要想控制她就难了。为了达到长期控制她的目的,趁她还没有来得及远走高飞,刘家就在1938年的农历二月初八,匆匆地为筱文艳和陈玉虎完婚。

国壶



时候,贵国有个容西法师,几次来华,为的就是把我中华的茶道学回去,这本书就是他写的,不过,其中很多地方,都是抄了陆羽的《茶经》,呵呵呵呵!又问:陆羽该知道吧!古子樱局促地答道:他是贵国的茶圣。在日本也享有盛誉。唔,你们日本人好学,有时候会用些手段。古子樱求援似的朝袁朴生看了一眼。他发现袁朴生也是一脸的紧张。陶半坡说着说着,神态就不由自主地有些居高临下。答不上来的时候,古子樱就站起来鞠躬。

陶半坡借着酒兴,思绪如炬若天马行空,言语雄辩似水银泻地。说到历史,他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说中国自古就是日本的老师,大唐茶文化乃是日本茶文化的基础,日本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相当我中华的唐代和宋朝初期,日本皇室从舒明天皇二年至宽平六年间,先后19次派遣唐使到中国,礼佛求法,学习中国人如何焚香、诵经、烹茶、修行,把自然清淡的禅风和茶风带回日本,他们来的时候是空着手的,走的时候却是满满当当,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典籍、茶器、礼仪,还有制茶的方法,一点不留地带走了,呵呵,谁让们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呢?说着说着就把目光转向了袁朴生。

我大清国乃世界中央之大国。威仪四海,朋满天下。既然我们教日本人学会了茶道、茶礼、茶艺,又何妨再教他们一点壶艺呢?以老夫愚见,既然日本人盛情相邀,袁师傅不可不往。袁朴生扑通一声跪下了。朗声说:谢大人指点!古子樱双腿一软,也跟着跪下了。这老头的气场之大,胜过那一罐浓香盛郁的好酒啊,古子樱想。陶半坡将两人搀起。吩咐下人端上来一个印盒,鲨鱼皮质,四角包银,看上去精致而华贵。陶半坡打开印盒,取出一枚正方形的鸡血石印章,上面刻着六个古篆大字:大清袁朴生印。陶半坡笑道:老夫手笨,这枚印章刻了整整三日。老了,不中用了。袁朴生又跪下了。含着热泪道:谢陶大人再造之恩,门生一定不辜负大人期望。陶半坡叮嘱道:此去东瀛,乃展我大唐之风,袁师傅教会他们壶艺,便早早回来。届时老夫依然设家宴为你把盏洗尘,庆贺凯旋。一连数日,陶半坡那一番谆谆话语,一直萦绕在袁朴生的心头。